

文房雅器

康小兵
主编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康小兵

1992年参加文博工作，从事文物保管工作二十余年。现为文博副研究馆员，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参与编写《古玉集珍》《民间藏珍》《岁月旧梦》等专业书籍。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文房雅器 / 康小兵主编. — 石家庄: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 - 7 - 5375 - 9085 - 3

I. ①文… II. ①康… III. ①文化用品 - 介绍 - 中国 - 古代 IV. ①K87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4349 号

文房雅器

康小兵 主编

出版发行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编: 050061)
印 刷	河北新华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9.5
字 数	132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前言

“文房”广义解释为文人书斋或画室，狭义则专指书写、绘画与读书的文具。文房雅器既是书房的用具，亦是文人雅客赏玩之物，悠悠历史长达千年。古人亦称文房清供，所谓“供”，即供奉，自然是圣洁高贵之物；所谓“清”，可以是清雅不俗，可以是清逸不浊，也可以是清心寡欲。所以，文房清供，其本来含义是文人书房中那些表达文人高雅气息与悠然古意的物品。

文房用具，在笔墨纸砚的基础上，相应的出现了数量众多、品类繁杂的辅助用具。有笔筒、笔插、笔匣、笔掭、笔洗、笔格、笔床；墨盒、墨床、水注、水丞；镇纸、臂搁、裁刀；砚滴、砚屏、印章、印盒、帖架、文具箱等等，可谓包罗万象、琳琅满目。

所用材质极其丰富，包括陶瓷、玉、石、金、银、铜、铁、水晶、玛瑙、漆器、玻璃、珐琅、景泰蓝以及竹、木、牙、角、珊瑚、犀角、紫砂等无所不备。

制作工艺繁复，包括绘画、铸造、烧造、雕刻、镶嵌等，几乎包含了制作工艺中的全部工艺。

文房雅器已远远超出了其实用价值，而更多的成为文人赏鉴之物。文人对其追捧，更多是在诉求一种精致的生活方式，一种古雅的生活态度，一种闲隐的生活追求。古人云：笔砚精良，人生一乐。文房清供作为文化遗产，不仅为我们了解古代的人文历史提供了丰富的佐证，同时也向我们揭示了古代文人雅士丰富的精神世界。



目 录

文房雅器

一、文房雅器的形成与发展	/ 001
二、文房雅器的特点	/ 014
三、文房雅器的品类	/ 020
(一) 与笔相关的文房雅器	/ 020
毛笔	/ 020
笔格	/ 034
笔掭	/ 036
笔洗	/ 038
笔筒	/ 041
(二) 与墨相关的文房雅器	/ 051
墨	/ 051
墨床	/ 069
刻铜墨盒	/ 071
(三) 与纸相关的文房雅器	/ 084
纸	/ 084
镇纸	/ 100
(四) 与砚相关的文房雅器	/ 105
砚台	/ 105
砚屏	/ 122
水注水丞	/ 126
(五) 其他文房雅器	/ 131
臂搁	/ 131
印盒	/ 135
香炉	/ 136
后记	/ 145

一、文房雅器的形成与发展

文房雅器的形成是继笔、墨、纸、砚成型以后，到汉代逐渐展露出世，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大致概括为四个发展阶段。

1. 东汉时期的形成阶段

“文房四宝”即笔、墨、纸、砚，是中国古代文人最常用的文房用具。关于文房四宝的起源，考古发现，最早源于汉代。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发现的西汉初年婴遂墓中出土存放文具的一件竹筩，里面有笔一支、圆形砚板一方、研石器一块、墨数锭、青铜书刀一把、无字木牍若干。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在纸张发明之前最早的文房用具，可以说是“文房四宝”的雏形。

汉代笔、墨、纸、砚用具已完成了从发生至初步成型的过程。以笔、墨、纸、砚为主的书写用具，逐渐确立了其相辅相成的地位。在长期的生活实践过程中，逐渐发展成熟。此后，辅助笔、墨、纸、砚的文房器具相继出现。现知最早砚的辅助用具应是汉代的砚滴。如江苏扬州老虎墩东汉墓出土的一件白玉飞熊砚滴，形制小巧，主要用于滴水研墨。这一时期，彩绘漆器成熟发展，并有大量官作制品，用于调色的辅助文房实用器具也有少量出现。这时文房器具从实用上逐渐完善，相应的辅助用具也初具成型。

2.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阶段

“文房”一词最早见诸文献的是南北朝时期，当时专指国家典掌文翰的地方。《梁书·江革传》云：“此段雍府妙选英才，文房之职，总卿昆季，可谓馭二龙于长途，骋骐驎于千里。”这里的“文房”，有点类似今天的档案馆。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房用具得到全面的发展，出现多种形制的辅助用具，其质地和造型出新，并形成定式，对后世形制的发展颇有影响。文献史籍多有记载。如西晋葛洪《西京杂记》记述：“晋灵公冢……其余器物皆朽烂，不可别，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润如新，王（广川）取以为书滴。”记载了广川王盗墓得玉蟾蜍，改制为书滴，即砚滴。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注水用具，如水盂、水注等。造型小巧精致，一般为小口，圆腹。材质有陶、瓷、玉、铜等。两晋时期，以越窑的青瓷水盂最具特点，并在各地广泛制作，其中蛙形青瓷水盂成为独特的造型，一时流行于世，并争相效仿。文房清供呈现发展趋势。

3. 唐宋时期的兴盛阶段

文房一词，在唐代以前是指官府掌管文书之处。到了唐代，文房的概念起了决定性的变化，成了文人学士书斋的同义词了。如元稹在《酬乐天东南行》诗中提到“文房长遣闭，经肆未曾铺”。陆龟蒙在《石笔架子赋》中提到：“叨居谈柄之列，辱在文房之里。”

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文人士大夫圈子里开始兴起给自己的居室或书斋取室名之风，历史上有记载的如白居易的“池北书库”、刘禹锡的“陋室”、司空图的“休休亭”、李林甫的“偃月堂”、杨国忠的“四香阁”等，特别是晚唐宰相李泌给自己书斋取号“端居室”并琢成印章的做法，标志着文房在文人士大夫生活中的地位正式得到了确认。至于文房一词最早见诸印记，当推南唐李后主的“建业文房之印”，他常在收藏的法书名画中钤有此鉴藏印。所谓的建业文房，是指他在金陵宫中蓄藏字画



古玩澄心堂，当时澄心堂纸、李廷珪墨和龙尾砚（即歙砚）曾被誉为“南唐三宝”，为文人士大夫所珍视，北宋年间已是不易求取。当时著名书法家蔡襄在得到一方质地极佳的端砚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特地“以澄心堂纸、李廷珪墨、诸葛高鼠须笔为之记”。

唐代文学家文嵩曾作有《四侯传》，将笔、砚、纸、墨分别予以拟人化，不但有名有姓，而且封侯拜相。其中笔为管城侯毛元锐（字文锋），砚为即墨侯石虚中（字居默），纸为好畤侯楮知白（字守元），墨为松滋侯易玄光（字处晦）。晚唐文学家韩愈也将笔、墨、砚、纸拟人化，称之为中山毛颖、绛人陈元、弘农陶泓和会稽楮先生。北宋太宗年间，翰林学士苏易简第一次将历史上有关笔、砚、纸、墨的记载汇编成《文房四谱》一书，苏本人在后序中提到：“吾见其决泄古先之道，发扬翰墨之精，莫不由是四者方传之无穷乎。”文学家徐铉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提到苏学士“退食之室（当指文房），图书在焉，笔砚纸墨，余无长物，以为此四者为学所资，不可斯须而阙者也。由是讨其根源，纪其故实，参以古今之变，继之赋颂之作，各从其类次而谱之，有条不紊，既精且博”。此书一问世，文房四宝的概念乃正式确定无疑。

有意思的是文房四宝的排列次序。现在通常是按笔、墨、纸、砚顺序排列，不但朗朗上口，而且很能体现出其实用价值的重要程度。而在唐宋时代，习惯上是按笔、砚、纸、墨次序排列的，如宋代苏易简的《文房四谱》便是如此，一直到清代乾隆年间，清高宗在为《西清砚谱》所作的序中，也是这样认为：“向昧文房四事，谓笔砚纸墨，文房所必资也。”如果从各自的创始时间相考，根据现有考古发现实物证实，笔、砚创始于战国时期，砚应稍晚于笔，墨创始于秦代，纸创始于西汉，故应按笔、砚、墨、纸顺序排列。而从其收藏、欣赏价值角度来说，当以砚、墨、笔、纸为顺序。文房四宝中以砚与墨最具赏玩价值，历史上以藏砚、藏墨知名的文人墨客代不乏人，文人学士尤其对于砚有着特别的情愫，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中写道：“砚为文房最要之具。”同时代另一位隐士陈继儒写来更具感情色彩：“文人之有砚，犹如美人之有镜，



最相亲傍。”宋代书画家米芾素有砚癖，他在回答一位向他索取藏砚的友人书帖中这样写道：“辱教须宝砚，去心者为失心之人，去首者乃项羽也，砚为吾首，谁人教唆，事须根究。”将藏砚视作自己的首级和生命。这可视为文人爱砚的最生动写照。

文房四宝中，纸的文化意蕴和赏玩价值相对来说最为低下，但不可否认，纸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也是文房四宝中最重要的发明。它不但给书写、绘画材料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也带动了其他文房器具的更新进步。纸虽然创始于西汉，但真正达到一定光洁度从而便于挥洒书画，还是在两晋南北朝。

文房四宝尽管创始很早，但是一直发展到唐宋时期，即传统书画艺术趋向成熟和文人士大夫集团形成以后，它们才真正找到并且实现了自己应有的地位和价值，成为文人书斋案头不可或缺的器用。

唐代是一个文化昌盛的时代，科举制的最终奠定，使文人的地位得以确立和尊崇，文人学士的审美情趣随之也得以弘扬光大。特别是文房概念和地位的正式确定，从而使得“我辈自有乐地”（南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序）。当时，文房器具已由纯粹的实用器具发展成为观赏把玩的对象。以唐代的笔、砚为例。据宋代郭若虚《国画见闻志》等的记载，唐代德州刺史王倚有一支竹刻笔管，上刻《从军行》诗二句：“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并有诗意刻绘：“人马毛发，亭台远水，无不精绝。”这段文字是竹刻艺术见于著录之始，这支笔管大概也是见诸笔端最早，也是最典型的一件文玩了。至于石砚，晚唐诗人陆龟蒙在《袭美以紫石砚见赠以诗迎之》中提到：“霞骨坚来玉自愁，琢成飞燕古钗头。”是为赞美端砚的琢工。

宋朝建立后，中央集权政治削弱了国家军事力量的发展，而采用重文轻武的治国方针，致使宋代的军事力量一直积弱不振，而文化却得到了欣欣向荣的发展。书法、绘画、雕刻等各部门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文学家、书法家、思想家、艺术家等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文风鼎盛。宋徽宗在政治上昏庸腐败，受尽屈辱，在文化艺术方面却有杰出贡献。



宋徽宗本人酷爱书法，创造出“瘦金体”这一书体，是书法史上极具个性的一种楷书书体，他喜欢画花鸟画，自成“院体”。由于他本人对绘画书法艺术的喜爱，因而扩充翰林图画院，提高画工的社会地位。他搜集天下奇石，将江南的奇花异石运至京城，来装点宫廷园林。此时兴起的金石学之风，又带动文人雅士对文房四宝、文房雅玩的收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陆续出现了许多文人鉴赏家赞誉文房器物的诗句和著作。

宋代，南唐归宗的翰林学士苏易简以笔、墨、纸、砚“为学所资，不可斯须而阙”，撰写了《文房四谱》一书，此书“笔谱”二卷，“砚谱”“纸谱”“墨谱”各一卷，共计五卷。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是首倡“文房四宝”的典籍，因而后人提到文房四宝，必会谈及《文房四谱》。这部书也是宋初文玩清供风尚的发端。

文房四宝之名，最早出现于北宋诗人梅尧臣的笔下，他在《九月六日登舟再和潘歙州纸砚》一诗中曰：“文房四宝出二郡，迩来赏爱君与予。”后来还有人将这四件物品称为文房四物，北宋文学家陈师道《寇参军集》曰：“张、李氏之墨，吴、唐、蜀、闽、两越之纸，端溪、歙穴之砚，鼠须、栗尾、狸毫、兔颖之笔，所谓文房四物。”到了南宋，大诗人陆游将它称为文房四士，他在《闲居无客所与度日笔砚纸墨而已戏作长句》诗中写道：“水复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独相依。”

北宋文人雅士营建庭园，建造书屋，布置书房，以挑选精良的笔墨纸砚，并制作相关的文房辅助用具为乐趣。苏东坡酷爱良墨与歙砚，其《东坡题跋》曰：“余蓄墨数百挺，暇日辄出品试之，然终无墨者，其间不过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间佳物，自是难得。”又《孔毅甫龙尾石砚铭》曰：“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瓜肤而穀里，金声而玉德，厚而坚，足以阅人于古今。朴而重，不能随人以南北。”说明苏东坡对文房用具的喜爱与研究。宋著名书法家苏沧浪，原名苏舜钦，曾在苏州建沧浪亭而得名，有诗曰：“明窗净几，笔墨纸砚，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可知苏舜钦以拥有优良精美的文房用具为人生一大乐趣。另外，还有欧阳修的《砚谱》、唐询的《砚录》、米芾的《砚史》等等。



南宋承袭北宋玩赏文房用具之风气，延续而得到发展，南宋都城在南方的杭州，经济繁荣、鱼米之乡，文人荟萃。南宋文人赵希鹄撰写了《洞天清禄集》，载“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人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端砚涌崖泉，焦桐鸣玉佩，不知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说明了赵希鹄在文房雅玩中所享受到的乐趣。此书别具一格，第一次将文人雅士玩赏的各种文房雅玩分成十大类，并将每类加以详细说明。这十大类分别为：古琴、古砚、怪石、古钟鼎彝器、砚屏、笔格、水滴、古翰真迹、古画、古今石刻。这十类文房实用功能意义已经不大，已经从实用转向文人赏玩的器物，同时也说明了文房雅器的概念，正向更大的范围扩展。南宋赵希鹄撰写的《洞天清禄集》有“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汁盈砚池，以供一日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有关压尺的宋代记载也颇多，例如龙大渊的《古玉图谱》、周必大的《玉堂杂记》、李昭玘的《乐静集》与刘宰的《家藏集》等，分别记载着玉、石、檀香等材质压尺。宋林洪的《文房图赞》中有臂搁的记录。在宋代的《槐阴消夏图》《西园雅集图》等绘画中，出现了笔插的形象。另外，在宋岳珂《槐郊录》中也记载着：“御前列金器，如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漏之属，计金二百两。”从上述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宋代的文玩不仅门类丰富、用途广泛，而且制作材料也非常讲究。由此可见，宋代在流行文房雅玩的同时，也开启了文房雅玩收藏的先河。

淳熙年间，宋高宗爱好文玩，在龙大渊编著的《古玉图谱》一书中，全部是宋高宗收藏的“燕几清玩”的古玉器等，全书共一百册，里面所有的图谱，全部由当时的宫廷画师马远、李唐、刘松年、夏珪等人所画。全书按照古玉器的用途共分为国宝部、压胜部、舆服部、文房部、薰燎部、饮器部、彝器部、音乐部、陈设部，全书共收录了古玉七百余件，其中文房部共收录了七十九件玉器。最早为秦汉时代，最晚为宋徽宗时，器类有砚、笔管、砚山、笔床、水丞、水注、书镇、书尺、裁刀、贝光、搔劳、界尺、如意等十六种。这是将文房器玩单独作为一个门类出现在



谱录之中，由原先的文房四宝扩大到了文房四宝所衍生的器具。

唐宋时期，文房清供的兴盛发展，主要表现在造型、质地不断出新，其不仅形制种类多样，而且还出现有成套组合或一器两用的形式，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特点。1981年在浙江诸暨发现的南宋嘉定元年董康嗣合坟墓中出土了一套成组的石质文房用具，有蕉叶白端砚一方，石雕山峦笔架，犀牛镇纸两件，龟钮水盂，其石质色泽黝黑，细腻滑润，造型别致，可谓罕见。浙江衢州南宋咸淳年间史绳祖墓中出土了多件文房器具，其中有青玉笔架、水晶笔架、白玉兔形镇纸、玉荷叶形洗、白玉印等，呈现多件组合的形式，反映了这一时期文房清供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器两用的形式，如江苏无锡兴竹宋墓出土了一件影青瓷笔架水注，造型为双兽形，兽体中空为水注，其上出角形似笔架，为一器两用的形制。此外，在长沙窑中也有大量的瓷笔掭、水注、镇纸发现。上述这些实用器具，笔架、镇纸、水注、笔洗等均为宋代流行器具。这一时期，文房清供器具的形式种类多样，并不断创新发展。

4. 明清时期的繁荣阶段

文房清供发展到明清之际进入了繁荣阶段。这一时期，由于文房四宝的兴盛发展，与之相应发展的辅助用具更出奇精巧，形式多样。如水丞、砚滴、水注、笔洗、笔筒、笔格、墨床、砚屏、镇纸、臂搁、印盒、印章等用具，在书斋文案上各居其位，各司其职，日臻完善，成为文人必备之物。文房清供的种类、材质、形制等方面发展到了极致。

明清之际文房清供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休戚相关。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阶层迅速扩大，对于书斋文房清供的需求也日益增强。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传统手工艺人的创造能力，使文房清供的制作得到全面发展，可以说是集多种工艺之大成。

如果说宋代是文房器具制造的勃兴时期的话，那么明代中晚期就是其发展的一个高潮阶段，这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推动当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在明代文献中有大量记载，出现专门的著述。明代初年，曹昭的《格



古要论》一书问世。该书“使玉石金珠琴书，图画古器异材莫不明其出处，表其指归，而真伪之分了然在目”大致也是承续了南宋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一书，与之稍为不同之处在于新增了珍宝、古铜、古窑器、古漆器、古锦、异木、竹等杂项。后来明末王佐又增补了文房论，其中有笔、墨、纸、印泥、浆糊、灯油等杂项。

明代中后期，由于文人学士对闲情逸致的追求和对古董珍玩的搜藏，出现了许多描绘“艺苑之闲情，山家之清供”的鉴赏类著述，其中大多有对文房器玩的专门论述，计有屠隆的《考槃馀事》、高濂的《遵生八笺》、文震亨的《长物志》、张应文的《清秘藏》、李渔的《闲情偶寄》等。其中屠隆在《考槃馀事·文房器具笺》中，罗列的文房器具名目竟有45种之多，计有：笔格、研山、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砚、水中丞、水注、研匣、墨匣、印章、图书匣、印色池、糊斗、蜡斗、镇纸、压尺、秘阁、贝光、暖砚、裁刀、剪刀、途利、书灯、香橼盘、布泉、钩、簫、麈、如意、诗筒葵笺、韵牌、五岳图、花尊、钟、磬、禅灯、数珠、钵、番经、镜、轩辕镜、剑等。至此，文房器玩的范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界定。



明代朱守城墓出土的文房用具

明代文学家、鉴赏家高濂的《高子书斋说》中，巨细靡遗地罗列了：“书斋……窗外四壁，薜萝满墙，中列松桧盆景，或建兰一二，绕砌种以翠芸草令遍，茂则青葱郁然。旁置洗砚池一，更设盆池，近窗处，蓄

金鲫五七头，以观天机活泼。斋中长桌一，古砚一，旧古铜水注一，旧窑笔格一，斑竹笔筒一，旧窑笔洗一，糊斗一，水中丞一，铜石镇纸一。左置榻床一，榻下滚脚凳一，床头小几一，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一。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闲时置蒲石于上，收朝露以清目。或置鼎炉一，用烧印篆清香。冬置暖砚炉一，壁间挂古琴一，中置几一，如吴中云林几式最佳。壁间悬画一。……上奉乌思藏镡金佛一，或倭漆龕，或花梨木龕以居之。上用小石盆一，或灵壁应石，将乐石，昆山石，大不过五六寸，而天然奇怪，透漏瘦削，无斧凿痕者为佳。次则燕石，钟乳石，白石，土玛瑙石，亦有可观者。盆用白定官哥青东磁均州窑为上，而时窑次之。几外炉一，花瓶一，匙箸瓶一，香盒一，四者等差远甚，惟博雅者择之。然而炉制惟汝炉，鼎炉，戟耳彝炉三者为佳。大以腹横三寸极矣。瓶用胆瓶花觚为最，次用宋磁鹅颈瓶，余不堪供。壁间当可处，悬壁瓶一，四时插花。坐列吴兴笋凳六，禅椅一，拂尘、搔背、棕帚各一，竹、铁如意一。右列书架一，上置……此皆山人适志备览，书室中所当置者。画卷旧人山水、人物、花鸟，或名贤墨迹，各若干轴，用以充架。斋中永日据席，长夜篝灯，无事扰心，阅此自乐，逍遥余岁，以终天年。”由此可见，高濂描述的书斋内各种文房用具完备，能在这样的书房内，“永日据席，长夜篝灯，无事扰心，阅此自乐，逍遥余岁，以终天年”，可以说是文人毕生的追求。

同时代另一位著名鉴赏家文震亨在《长物志》一书中，有一段描述“文具箱”内放置器玩的文字。这种文具箱是为了方便文人雅士出游访友而设计的，其雏形至早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如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发掘的1号楚墓中，随葬有一只文具箱，里面放置了毛笔、笔管、铜削刀、竹简以及制作简牍的铜锯、铜铍、铜刻刀、铜夹刻刀、铜锥等器具。到了明代文震亨的笔下，文具箱的内涵和外延均有了很大的变化。

文震亨笔下的文具箱：“三格一替（屉），替中置小端砚一，笔觚一，书册一，小砚山一，宣德墨一，倭漆墨匣一。首格置玉秘阁一，古玉或铜镇纸一，宾铁古刀大小各一，古玉柄棕帚一，笔船一，高丽笔二



支；次格古铜水盂一，糊斗、蜡斗各一，古铜水杓一，青绿鎏金小洗一；下格稍高，置小宣铜彝炉一，宋剔盒一，倭漆小撞（提盒）、白定或五色定小盒各一，倭小花尊或小斛一。图书匣一，中藏古玉印池、古玉印、鎏金印绝佳者数方。倭漆小梳匣一，中置玳瑁小梳及古玉口匣等器，古犀玉小杯二。他如古玩中有精雅者皆可入之，以供玩赏。”上述高濂所述的几案清供和文震亨所述的箱盒器玩，均可视为当时文房器玩中常见的品种。

虽然文房器具的品类发展至晚明已大致齐备，不过，从传世实物可知，不论是质量之精，还是数量之众，乃至器形之丰、材质之全，清代宫廷制造的御用文房清供，都远远超过前代。

笔筒、镇尺、印盒、臂搁、砚屏、墨罐等大量出现，极大地丰富了文房用具的种类，也使各项辅助用具的功能更为完备。各种材质如陶瓷、竹木、象牙、玉石、玛瑙、水晶、金银、珐琅、铜、铁等，都被用来制作各式文房清供器具，成为书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清代宫廷御用文房器具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清代康熙时期内廷作坊林立，招募各地能工巧匠，专门承做内廷室内陈设器具，文房清供的制作也极为讲究，皇帝所居之处，斋堂轩室，书房需有大量的清供陈设。据记载，清代皇帝根据个人的喜好，都有增设和更换各处陈设，特别是在乾隆时期，宫廷文化生活极为丰富，制作有大量的陈设器具并传于后世。清代嘉庆、道光以后，开始禁止扬州贡玉，或酌减贡物，其制作规模逐渐缩小，各地进贡物品的数量也明显减少，其质地、种类也日渐式微。清代内廷文房清供的制作，均为造办处各作坊承办，特别是乾隆时期，其制作规模、数量庞大，内廷器具的制作过程，均有档案记载，这些不仅反映了内廷作坊管理的极其严格，从中也可得知其制作的规模。如乾隆三十五年内廷档案“匣作”记载所列配匣文具

有“白玉佛手笔搯一件，（木座）腰元洗，青花白地小水盛一件，青绿哈喇笔搯，青玉瓜式水盛，白玉双鱼洗，掐丝珐琅水注，霁红笔洗一件，青绿马纸镇，青花白墨罐一件，哥窑小笔洗一件，白玉合卺觚，配得合



牌座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交淳化轩续入多宝格内摆。”还有“定窑有盖墨罐一件，定窑水注，青绿龟式水注，汉玉鸳鸯水注，哥窑葵花笔洗”，其中所列清供器具有水丞、墨罐、笔掭、笔洗、水注、镇纸均按不同功用分别命名，其质地、种类多样，造型也出奇精巧。

清代内廷书斋陈设更为讲究，文房清供器具制作精美。康、雍、乾时期承袭旧制并不断创新。特别是乾隆皇帝对文房清供更是珍爱备至，不仅大量制作陈设或赏玩，而且有大量御制诗篇题咏，如《咏乌玉笔筒》《咏和田玉荷叶洗》《咏玉天鹿砚》等。乾隆时期制作数量也极为可观，内廷造办处活计档多有记载，除地方各织造承办的年例贡品外，内廷造办处各作坊还有大量的制品，多遵照皇帝的旨意设计样式，有成组多宝格形式或成套制作的文房清供，还有便于外出使用的旅行用文具箱等，都是典型的内廷造办处制品。这些均体现了乾隆时期文房清供制作的繁荣发展。



乾隆皇帝写字像

以乾隆皇帝在养心殿西暖阁辟出的三希堂为例,其面积仅八平方米,但文房器具的陈设却相当丰富。今天还能见到嘉庆七年十一月所记录的《养心殿西暖阁陈设档》,基本可以反映乾隆时期风貌,仅就其中紫檀木炕桌上下所摆放物件以见一斑。

紫檀木炕桌上:汉玉九喜筒一件(紫檀木座,内插笔二支、钱维城字无名画扇一柄);青白玉葫芦洗一件(有缺紫檀木座);青白玉三羊一件(有缺紫檀木座);青白玉钟一件(有缺紫檀木座);汉玉筒一件(紫檀木座);白玉螭虎花插一件(有缺紫檀木座);刻字澄泥砚一方(紫檀木刻字匣盛);汉玉水盛一件(珊瑚匙、紫檀木座);冻石图章笔山一件(上刻诗紫檀木座);汉玉乳钉璧墨床一件(紫檀木座);“茹古涵晖”紫檀木罩盖盒一件,内盛:《御临三希文翰》册页一册(汉玉六件)。

案下设:《三希堂法帖》八套(鹵漱木套铜母子)。

清代宫廷文房器

具之所以取得极高的工艺成就,在于皇帝本人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进行严格的管理。早在雍正五年,雍正皇帝就曾明确提出要求:“朕看从前

造办处所造的活计,好



清 贴黄几式文具箱

的虽少,还是内廷恭造式样,近来虽其巧妙,大有外造之气。尔等再做时不要失其内廷恭造之式。”“内廷恭造之式”指的就是宫廷工艺的理想范式。乾隆继承乃父之风,对于“恭造式样”的倡导与推动更加不遗余力。从档案记载看,一件作品在设计阶段就要经反复推敲,确定样稿。样稿包括平面的画样及立体的木样、蜡样、合牌样等数种,以画样应用最为普遍。使用样稿的目的在于令工匠能直观地理解活计的器形、纹样,

